

# 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的複雜關係\*

單世聯

---

**[提 要]** “軟實力”的核心是吸引力，但美國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流行文化並不能發揮軟實力的功能，這是“文明衝突論”所發現的問題。“文明衝突論”的實質是基於不同宗教傳統的國家衝突論。本文認為，“軟實力”理論與“文明衝突論”都有過度政治化的傾向。文化當然是政治，有衝突，但文化還有共享性、人類性。一個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更應當在理論上重視文化的普遍內涵，在實踐上致力於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

**[關鍵詞]** 軟實力 文化產業 文明衝突 文化政治

**[中圖分類號]** G1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4) 03 - 0161 - 12

---

文化政治是當代政治的新形式，它不僅發生在民族、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內部，也在國際關係、國際政治中粉墨登場。1940 年代，中國學者馮友蘭指出：“我們承認所謂天然狀態是野蠻底狀態，我亦承認在國之上需有，而且應有一種更高層次的組織，使國與國的關係，亦能脫離所謂天然狀態。我們亦承認，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已有此種覺悟，而上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政治的趨勢，亦於一個短時期中，有照著這個方向走底模樣。……然亦不過是趨勢而已，不過模樣而已。即此趨勢，即此模樣，亦只於上次戰後一個短時期內有之。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國與國之關係，自古及今，始終是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sup>①</sup>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強權和霸權依然存在，但道義的力量、文明的力量確實已經擁有比過去大得多的力量可以影響和制止像日本侵華那樣的戰爭。根據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的研究，國際關係中歷史地存在三種政治文化模式。第一種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文化，這是一種無政府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在其中，各行為體不承認相互存在的權利，趨於無限制的使用暴力，直至消滅對方或被對方消滅。這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然狀態。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John Locke）文化，這是由競爭對手的角色結構建立的，其核心內容是競爭（rivalry）。競爭和敵意有著本質的不同：競爭的雙方相互承認生存和財產的權利，這種承認由主權制度表現出來。競爭對手不像敵人那樣具有生死攸關的威脅，不會試圖統治和消滅對方。第三種文化模式是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這是

---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發展研究”（項目號 10BZX078）的階段性成果。

由朋友的角色結構確立的，其核心內容是友誼。在康德文化中，國家之間相互再現為朋友，並為之遵守兩條基本規則，即非暴力規則和互助規則。這不是說朋友之間沒有利益衝突，而是朋友之間不使用暴力解決利益衝突問題。<sup>②</sup>現階段的國家競爭一般不是消滅或同化對方的惡性競爭，而和諧世界也還只是人類追求的理想，所以目前的狀態是介於霍布斯文化與康德文化之間的洛克文化，大量的國際競爭同時具有衝突性和包容性兩種性質。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遭到全世界的反對；而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重要理由，就是這一行動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這說明當代國際關係是有規則可循的，雖然不是每個國家都遵守這些規則。冷戰後的國際競爭主要不是武力入侵和領土佔領等傳統的方式，而更多是以經濟擴張和文化滲透的方式，其在理論上的表達，就是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軟權力”與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本文所欲討論的，是兩種理論中與文化產業相關的問題，中心問題是：文化產業是否構成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一個方面。

### 一、文化產業構成美國的軟實力

儘管有關“軟權力”（soft power，一譯軟實力、軟力量）的理論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其實踐也可追溯到 1950 年代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但只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一概念及相關實踐才被全面運用到國際競爭之中，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戰略之一。1990 年，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約瑟夫·奈在《軟權力》（*Soft Power*）一文中率先正式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用以解釋、分析兩個重要現實問題。第一，如何評估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實力與地位？1980 年代末，美國輿論界圍繞“美國是否走向衰落”這一問題而發生了一場論戰。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 1986 年出版的《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認為，歷史上的諸多大國都因“過度擴張”（over-expansion）而最終走向衰落，美國也無法避免這樣的命運。這一悲觀的論點因得到許多經驗的支持而頗受歡迎。但三年後，約瑟夫·奈卻在《註定的領導》（*Bound to Lead*）一書中提出相反的觀點：即使承認美國的相對實力確實不如二戰剛剛結束之時，它也不會像蘇聯那樣走向衰落，因為美國還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如世界上最強大的教育和科技體系，最具有吸引力的多元文化、民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美國文化是另一種無需投入過多卻極其有用的軟權力資源。顯然，美國文化的某些方面對其他人民並無吸引力，而在評估文化權力資源時往往存在偏見的危險。但是，體現在產品和交流之中的美國大眾文化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從未到過美國的日本年輕人身穿印著美國大學名字的運動服。即使在尼加拉瓜政府與受到美國支持的遊擊隊作戰之時，其電視台依舊播放美國影片。同樣，蘇聯的青少年身穿牛仔褲，四處搜尋美國唱片。儘管中國政府抗議美國的干涉，中國民眾卻依然鍾情於美國的民主和文化。當然，大眾文化不乏淺薄和追求時髦的因素，但一個支配著大眾交往渠道的國家有更多機會傳遞自己的信息、影響其他國家的傾向卻是不爭的事實。”<sup>③</sup>在約瑟夫·奈看來，這種新型的“軟權力”是美國在未來世界政治中制勝的法寶，他所說的“大眾文化”，基本上就是文化產業提供的文化商品與服務。第二，如何解釋當代世界的新因素？這些因素包括跨國公司在通信和交通的新形式支持下的加速發展，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不斷提高，政府干預過多可能會帶來巨大損失；大量跨國行為體不僅限制著各國追求其國家利益的途徑，也影響著定義這些利益的方式，使得世界政治的聯盟更趨複雜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城市化和交流的增強導致權力從政府擴散到私有行為體，民族意識的覺醒，國家能力因現代

技術的普及而得到加強，使得軍事干預的代價更為高昂；生態變化、愛滋病、非法毒品交易和恐怖主義等具有跨國性質的問題，需要採取集體行動。如此等等。傳統的權力工具不足以應付世界政治的這些新困境，新趨勢預示著傳統途徑之外的第二種、更具吸引力的權力運用方式：“第二種權力（當一個國家使得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的目標為目標時，這種權力就出現了）可以稱為同化權力（co-optive power）或軟權力，它與命令他者按照其意志行動的硬權力形成了對照。……軟性的同化權力與硬性的指揮權力同樣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其權力被他國視為合法，則它將遭受更少對其所期望的目標的抵制。如果其文化與意識形態有吸引力，其他國家將願意追隨其後。如果該國能夠建立與其社會相一致的國際規範，則它無需被迫改變。如果該國支持使得他國按照主導國家的預期採取行動或限制自身行為的制度，它可能無需以高昂的代價運用強制性權力或硬權力。概言之，權力正在變得更少轉化性、更少強制性、更趨無形化，政治問題的現代趨勢和變遷對權力及造就權力的資源的性質有著巨大的影響力。”<sup>④</sup>

從國際關係理論來看，“軟實力”理論意在補充現實主義模式的不足。所謂現實主義模式，即認為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體是國家，而其中心問題是戰爭和使用武力。這種模式可能接近現實，但它忽視了世界政治的太多方面，如觀念的作用。約瑟·奈對“軟權力”的具體解釋是：

一個國家達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結果，可能因為其他國家希望追隨它，羨慕其價值觀，以其為榜樣，渴望達到其繁榮和開放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實現世界政治目標的方式，確定議程，吸引其他國家，與通過威脅、運用軍事或經濟武器迫使他們改變一樣重要。軟權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吸引民眾，而不是迫使他們改變。確立預期的能力往往與無形的權力資源相關，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被視為合法的或有道義威信的政策等。如果我們能夠讓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由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一個國家代表著其他國家所期望信奉的價值觀念，由其領導潮流的成本就會降低。<sup>⑤</sup>

在2011年出版的、代表了作者對權力研究的“最終成果”的《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一書中，約瑟夫·奈更為概括地界定了軟實力的構成要素：“一國的軟實力主要依賴於三種基本資源：它的文化（在對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發揮作用）、它的政治價值觀（當它在國內遵循這些價值觀發揮作用）以及它的對外政策（在他人認為這些政策合法且具有道德權威時發揮作用）。潛在權力資源能否轉化為有吸引力的行為，影響他人實現有利的結果，上述括弧中的限定條件很重要。”<sup>⑥</sup>“軟權力”是一個國家以吸引的方式影響其他國家的能力，是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達到自己所願的能力。

“軟權力”與“硬權力”相對，後者指基於引誘（胡蘿蔔）或威脅（大棒）的命令權力，其效果是強迫；後者指非指令性的行使權力的方式，主要來自文化、政治價值觀和政策的吸引力，其效果是認同。軟硬之間的關係是：

硬權力與軟權力之間的區別，不過是行為性質、權力的有形性等的程度之差。兩種權力均是通過控制他國行為實現其目的的不同能力。命令性權力——改變他者所作所為的能力可能依賴於強制和引誘。同化權力——塑造他者期望的能力可依賴於某國文化和意識形態有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議程以使得其他國家無法實現其目標（因其過於不切實際）的能力。命令性權力與同化權力之間的行為形式可以用連續體表示如下：

命令性權力 ————— 同化權力

此外，軟權力資源往往與同化權力行為相關，硬權力資源往往與命令性行為相關。但是，二者關係並不理想。例如，某些國家可能因一個國家戰無不勝的神話而被吸引，命令性權力有時也被用於創建制度，之後被視為合法性權力。但是，一般性的關聯足以使我們就硬權力與軟權力的關係做出如上區分。<sup>①</sup>

“軟權力”這一概念與“華盛頓共識”及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論”一起，表達了冷戰後美國的自信。但“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之後，約瑟夫·奈又用這個概念來提醒美國，在國際行動中，不能僅僅憑藉軍事實力為所欲為，這樣做的後果反而會大大削弱美國軟實力的基礎。<sup>②</sup>可見，軟實力固然要以硬實力做基礎，但硬實力的行使也會妨礙軟實力的運作。

約瑟夫·奈所說的美國文化的吸引力主要是文化產業的產品。文化產業是擴張“軟權力”的先鋒，其產品與服務不只是特定傳統中的地方風習、民族慣例、文學藝術及其行為模式，不再是社會經濟權力之外的“飛地”或孤立絕緣的自律領域，而且是技術、娛樂與服務，是一種商品、一種經濟，具有確定的經濟利益，是社會生產力、也即硬實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文化產業產品與服務也蘊含著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其傳播過程既借助了權力，也體現了權力的擴張：美國的影像產品、動漫、電子遊戲、通俗文藝、美食、時裝、廣告等在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的同時，也誘導全球不同文化的人接受其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它也是一種權力、一種導向。隨著美國以及西方文化商品不斷向不同國家和地區傾銷，世界各地的許多孩子，已經不願意再聽他們的老奶奶講他們自己民族的古老神話和傳說故事，唐老鴨、侏羅紀、變形金剛、電子遊戲，差不多成了全球兒童生活的一部分，而美國的視聽產品則在全球人口中營造著美國夢和美好生活的暢想。比如“在陰雨連綿的里奧普魯斯散發著霉臭氣的小屋中，年輕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進行辯論。他們是印第安人和黑奴的混血的後代。辯論的題目是加利福利亞電視系列片《水上救生員》中從事水上救護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圍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邊的一位姑娘。”<sup>③</sup>中國的情況也並不好多少。陝北民歌《三十里鋪》是曾經流傳甚廣的一首歌曲，但當記者到歌曲的發生地陝北綏德三十里鋪村採訪時，那裡的女孩子都說沒有聽過，她們聽的都是流行歌曲。美國文化產業之所以具有全球傳播力和全球影響力並形成其國家軟實力，在於其文化與經濟、政治、技術的良性互動，在於其強大的硬實力支撐與其社會制度的吸引力。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將此稱之為“文化統治”：“文化統治是美國全球性力量的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方面。不管你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美學價值有什麼看法，美國大眾文化具有一種磁鐵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對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來自它宣揚的生活方式的享樂主義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卻是不可否認的。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大約占世界市場的3/4。美國的通俗音樂居於同樣的統治地位。同時，美國的時尚、飲食習慣甚至穿著，也越來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網用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的絕大部分鼓擊動作出自美國，影響著全球會話的內容。最後，美國已經成為那些尋求高等級教育的人的聖地，有近五十萬的外國學生湧向美國，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學生永不再回故國。在世界各大洲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內閣中都能找到美國大學的畢業生。”<sup>④</sup>“在這種吸引力的推動下，美國變成了一種無計劃、無政治導向的傳播文

化魅力的媒介。這種文化魅力逐漸滲入、充斥、同化並重新塑造著人類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人的外部行為，最終改變著他們的內心世界。毫不誇張地說，這種生活方式到處傳播，潛移默化地起著重新定義的作用。它的穿透力勢不可擋。沒有任何一個大陸，也許甚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朝鮮可能是個例外）能夠抵禦它的影響。”<sup>①</sup>

應當說，至少在目前階段的全球文化中，美國文化還沒有形成“統治”地位，但美國文化產業確實在全球擴張並有效地複製、傳播了美國精神，並被普遍認為是美國文化軟實力的主要表現形式。在一些激進的反全球化言論中，全球化被等同於美國化，而美國化被等同於美國文化產業、特別是其流行文化，它對非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壓力，甚至成為非西方國家發展文化產業的動力之一。

## 二、文化產業不等於美國的軟實力

在全球文化競爭中，美國文化產業確實具有所向披靡、其勢難擋的能力，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宣傳了什麼樣的“美國精神”、加強了美國的文化霸權，卻是有疑問的。布熱津斯基就發現，當美國文化向全球滲透時，非西方人也會提問：

但它的政治意義何在？它會不會助長美國行使霸權？……實際上世界對美國很熟悉，這與美國的全球文化輸出和它在全球無所不在的影響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有關。正如美國文化會對外國社會產生吸引力一樣，美國的政策對外國政府也有著深遠的影響。世界跟美國打交道的實際經歷，以及打完交道後的反應怎樣，取決於美國的文化滲透和全球霸權的動態混合結果。

全球範圍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美國的實際熟悉程度能使人們對美國人的許多生活方式產生親近感，儘管也會加深人們對美國政策的怨恨。……

因此，對美國的實際熟悉產生的文化影響就與其政治影響產生了碰撞。美國文化魅力所產生的主要政治後果是，人們對美國的期望值要比對別國的高。……

因此，美國在受人仰慕的同時也遭人嫉恨。妒忌是導致嫉恨的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原因。它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人們覺得美國在全球到處伸手，幾乎影響到了每一個人，尤其是影響到那些通過實際經歷已經間接成了美國的延伸那部分的人。他們是美國大眾文化的迷戀者，甚至常常更願意親自參與其中。……

全球性的美國化還招致了對之對立的現象的存在，但多數情況下是在精英們中間，……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會有意識地否定並摒棄美國方式，他們強烈反對文化向單一發展，譴責文化貶值現象，認為這都是美國大眾文化的傳播所帶來的結果。……

美國文化在全球的魅力，在引起政治動盪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全球怨恨的焦點。<sup>②</sup>

一種被怨恨的文化當然不會是軟實力。這就是文化產業的悖論：美國文化商品與服務傳播了美國精神，也招致了對美國的不滿。不能因此就認定喜歡美國文化的人一定會反對美國的政策並對其文化產生怨恨，但這類事實的存在確實表明，美國文化商品向全球推廣的後果並不是全球文化的美國化。文化傳播的真實後果“取決於美國的文化滲透和全球霸權的動態混合結果”，既不是文化趨同，也不是文化衝突，而是文化的異質化、混雜化。這既是新興國家文化產業參與全球文化競爭的反映，也是文化產品在被接受的過程中必然被抵制、被改寫的後果。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是否所有的文化產品與服務都是軟實力？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通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進行。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意在探索冷戰結束後美國如何繼續發揮其在全球的主導作用的問題。他當然看到了危機，但仍較自信。當另一位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衝突”來分析國際關係時，這種樂觀態度已經明顯減少了。從1993年在《外交》季刊發表的《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到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亨廷頓提出了一個解釋冷戰後全球政治的新範式：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衝突來理解。其主要觀點是，冷戰之後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並呈現出多種複雜趨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間力量的對比會受到重大影響。因此，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間，核心國家間的關係將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既然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

“文明衝突論”針對的問題，是西方的衰落與非西方文化的復興。作為20世紀歷史的主題，西方的衰落表現在領土與人口、經濟產值、軍事能力等諸方面。歐洲殖民主義已成歷史，美國的霸權也面臨挑戰。接著約瑟夫·奈而來，亨廷頓追問：是什麼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呢？回答是硬權力：“如果它們被看作是植根於物質上的勝利和影響時，它們就是有吸引力的。軟權力只有建立在硬權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權力。硬的經濟和軍事權力的增長會提高自信心、自負感，以及更加相信與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軟權力更優越，並大大增強該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下降會導致自我懷疑、認同危機，並導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尋求經濟、軍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訣。當非西方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增長時，它們就會日益鼓吹自己的價值、體制和文化的優點。”<sup>⑬</sup>文化總是追隨權力，權力的擴張總是伴隨著文化的繁榮。隨著非西方社會的崛起，其本土的、植根於歷史的習俗、語言、信仰與體制也在自我伸張，西方文化也在受到侵蝕。而發生在非洲、中亞到東歐的不同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也確實表明文明在新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必須指出，亨廷頓並非提倡文明的衝突，而是認為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普世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亨廷頓明確區分了兩種對普世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統與現代”分析框架中的概念，它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中的概念，它將普世文明理解為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亨廷頓認為，文化的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徵。在多文明的世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他還具體提出三個原則：避免原則——核心國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共同調解原則——核心國家相互談判以遏制文明和國家或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共同性原則——

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無論這些原則是否有效或是否有多少新意，在理論上卻是合理的、正確的。“文明衝突論”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強調了文明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卻沒有關注文明內的差異和衝突；它正視了文明可能導致國際衝突的一面，卻沒有或較少看到文明在克服國際衝突方面的積極價值；它分析了文明作為主觀認同的意義，卻沒有處理這一意義與“人民、領土、財富、資源”等物質內容的關係，等等。最重要的是，亨廷頓以“文明”的單位代替了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單位，文明只不過是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另一種說法。在此論說中，文化的主體——人完全被淹沒在政治化、國家化的“文明”之中。這就是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所指出的文化研究的一種謬誤：“把文化想像成具有自己的力量和目的的自足‘超有機體’現實，即把它物體化。”<sup>④</sup>嚴格地說，亨廷頓此論還是一種政治論說，而不是文化理論。這或許是他作為政治學家過多地從政治來討論文化的緣故。

那麼，“文明”何以會衝突？亨廷頓有兩個層次的解釋。第一個層次，是現代化理論的分析。現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其獨特的特徵在以後的世紀中得到了發展，它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實現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徵產生於西方現代化之前。”<sup>⑤</sup>現代化不是西化，因此非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就有三種做法，一是同時拒絕現代化與西化，二是同時接受現代化與西化，三是區分現代化與西化，要前者而不要後者。但無論哪一種回應方式，現代化都不等於西方化。這其間的曲線是：“原先，西方化與現代化密切相聯，非西方社會吸收了西方文化相當多的因素，並在走向現代化中取得了緩慢的進展。然而，當現代化進度加快時，西方化的比率下降，本土化獲得了復興，於是進一步的現代化改變了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之間的文化均勢，加強了對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後期階段，現代化以兩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復興。在社會層面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在個人層面上，當傳統紐帶和社會關係斷裂時，現代化便造成了異化感和反常感，並導致了需要從宗教中尋求答案的認同危機。”<sup>⑥</sup>現代化導致的是文化復興而不是西方化，非西方文化的現代化減弱了西方文化，更加現代化與更少西方化是同一個過程。

第二個層次是人性的分析。世俗的現代化卻帶來宗教復興，這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人性的詭秘。人不能只靠理性活著，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後，他們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時才能理性地籌劃和行動。與那種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將導致宗教衰亡的假定相反，20世紀下半葉，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在全球展開的過程也就是全球性的宗教復興過程。“遍及世界的宗教復興是針對世俗化、道德相對主義和自我放縱的反應，也是對秩序、紀律、工作、互相幫助和人類團結的價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團體滿足了被國家官僚所忽視的需要，……因秩序和市民社會的破壞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團體、常常是原教旨主義宗教團體所填補。”<sup>⑦</sup>宗教復興運動是反世俗、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基督教中的表現外，也是反西方的，但總的看，它們沒有摒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資本主義、科學技術以及這些因素對社會組織造成的影響，也就是說，它們並不反現代化，但它們也沒有放棄古老的宗教信仰，沒有放棄以信仰來區分“我們”和“他們”的傳統。不同文明本來就是有差異的，現代化沒有取消、反而使這一差距明顯化了。不同的文明導致不同的認同，而文化認同上的分歧，是不可能解決的：“不同文明國家和集團之間的衝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總是產生集團之間衝突的東西；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對於另

外一個集團對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和體制強加於另一個集團的能力……物質利益的分歧可以談判，並常常可以通過妥協來解決，而這種方式卻無法解決文化問題。”<sup>⑩</sup>

西方引領的現代化後果之一是非西方的復興，所以發生衝突；人類的認同需要宗教，不同宗教會發生衝突，此即“文明衝突”。嚴格地說，所謂“文明衝突”就是宗教衝突的當代版。這裡有一個文明—國家—宗教的關係問題。

確如上說，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其實是國家或國家集體之間的衝突。其“文明”首先是指一個文化實體，文明與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人類最高的文化歸類，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別。文明既根據一些共同的客觀因素來界定，如語言、歷史、宗教、習俗、體制，也根據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來界定。……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它們’。”<sup>⑪</sup>全球可劃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這裡的“文明”實際上是指一些確定的區域政治範圍，如“西方文明”大體上可以理解為“西方世界”，“伊斯蘭文明”指的是阿拉伯國家加上西亞一直延伸到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家，“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大致就是蘇聯解體以前的東歐共產黨國家，“儒家文明”當然主要指中國。亨廷頓把文化想像成一種獨立自足的、有著自身力量 and 目的的實體，實際上是把文化實體化、國家化。問題是，他為什麼不說國家或國家集團，卻說“文明”呢？因為他所說的不同文明實際上源於不同的宗教，所以他才說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這個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就是主要宗教的發源地。

既然亨廷頓所說的“文明”就是源於宗教而又關係到人類生活的根本性信仰、信念、價值觀，那麼這種“文明”與當代文化產業提供的流行文化、消費文化也就毫不相干。他注意到：

通俗文化和消費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勝利，這一論點反而使西方文化變得無足輕重。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Magna Mac “巨無霸”）。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後者，但這對於它們接受前者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在中東的某個地方，幾個年輕人滿可以穿著牛仔褲，喝著可口可樂，聽著搖滾，但他們卻可以在向參加朝拜的間歇，造好一枚炸彈去炸毀美國飛機。<sup>⑫</sup>

美國消費模式與流行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引起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恐慌，使得“抵制美國文化霸權”成為這些國家的文化政策的基調。但作為一個美國利益的維護者，亨廷頓卻發現，儘管美國文化產業確實具有世界市場，但它並沒有發揮“軟權力”的作用。第一，這與人類對愛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義和財富的普遍興趣有關，因此它並不只屬於美國。第二，這與受利益驅動的美國公司利用這些興趣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關，因此它基本上是商業手段或營銷策略。總之，沒有或完全沒有證據表明普遍的文化商品、全球通訊的出現導致觀點和信仰的趨同，美國文化的全球流通並不表明美國軟實力的增強。

這是一個方面。亨廷頓沒有提到的另一個方面是，美國文化產業的商品所包含的享樂主義，既不能使非西方世界認同西方，同時也敗壞了西方和美國的文化傳統。布熱津斯基就認為：“美國和西歐一直都感到難以應付社會享樂主義的文化影響，以及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的社會中心地位急劇衰落所造成的文化影響。由此產生的文化危機又與毒品蔓延，特別是在美國還與種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最後，經濟增長已不再能滿足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這種欲望又受到一種鼓勵消費的文化的刺激。”<sup>⑬</sup>在《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中，布熱津斯基對美國文化產業提出了嚴厲指控：電視在締造美國文化及其基本信念中占主導地位，但它起的卻是特別消極的作用：刺激消費、鼓勵物欲甚至非道德的個人欲望、頌揚自我滿足、視強暴和野蠻為正常、鼓勵性亂行為、迎合最低級的本能。“總的看來，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價值觀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稱之為道德敗壞和文化墮落。在這方面，電視尤其是罪魁禍首。”<sup>23</sup>布熱津斯基等美國政治精英沒有忘記，享樂主義是羅馬帝國崩潰的原因之一。他們都認為，如果說西方國家的經驗和能力可以解決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較低的問題的話，那麼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卻是更重要的難題。

文化產業範圍廣闊，其產品和服務的效果並不都是布亨廷頓與布熱津斯基擔心的那樣，即以好萊塢而論，其中確有許多優秀之作很好地宣傳了美國形象，它們當然是美國的軟實力。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文化產業因為以市場取向為取向，所以其產品並不能像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那樣提供一種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它確實有吸引力，但很難影響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價值觀，當然也就不能發揮軟實力的作用。中國學者王京濱也認為：“傳統文化往往具有較強的認同，會成為一個團體無須明言的行為規範。這種認同不是靠內部人的定義，而是因外部環境才得到凸顯。傳統文化正因為擁有這種特徵，一般會與條文制度形成互補性體系。它被他者所模仿的難度越大，其價值就越高。與此相反，流行文化不具備傳統文化的這種行為規範特徵，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比較容易被模仿，甚至可以通過契約性交換獲得。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文化，一般來說是流行文化。這種文化是 19 世紀末以來伴隨美國的大量生產模式和‘品牌商品’的開發，寡頭壟斷企業利用新興媒體使人類社會‘普遍消費者化’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跨國企業的推動下，‘大眾消費社會’式的美國生活模式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傳播。然而，在該過程中得到傳播的僅僅是美國當代（或某一時期）的生活模式，並非其傳統文化。顯然，流行文化不具備長期效果，只會影響一些特定階層的特定消費者，更不會成為一個社會或一個團體的行為規範。因此，對約瑟夫·奈所謂的軟實力文化源泉，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加明確的概念，美國當代的流行文化並不是美國軟實力和源泉。”<sup>24</sup>

### 三、多元文化在瓦解美國文化

文化產業不等於文化軟實力，同樣，約瑟夫·奈自豪的美國多元文化也不全是軟實力，相反，它可能在瓦解著美國立國的精神基礎。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論題之一，是非西方國家擔心主要產自西方的文化商品和服務可能造成本土文化的流失，因而紛紛倡導文化“多樣性”以維護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與此同時，在美國，以“美國信念”、英語和美國核心文化的堅持者為一方，以種族主義、雙語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者為一方，展開了一場“解構美國與反解構之戰”。大量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堅持自己的文化而拒絕融入美國社會，“國民層次以下”的各種身份崛起，一些為數不多卻極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國際法專家以多元文化主義持續地攻擊美國對西方文化的認同，挑戰“美國信念”、英語和美國核心文化，否認存在一個共同的美國文化，提倡種族的、民族的和亞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分類，並凝聚“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此一思潮不但主張建立一個擁有眾多文明的國家，即一個不屬於任何文明、缺少一個文化核心的國家，而且，主張以集體權利代替個人權利。<sup>25</sup>

美國人喜歡差異，美國文化以多元包容為特點，美國夢就是個人創業夢，所有這些固然造就

了美國的輝煌，但一個多元的、沒有中心和基礎的文化，也可能是一種分裂的、衝突的文化。亨廷頓認為，文化上的差異會帶來憎恨和衝突：“……衝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動力，人們需要敵人：商業上的競爭者、取得成功的對手、政治上的反對派。對那些與自己不同並有能力傷害自己的人，人們自然地抱有不信任，並把他們視為威脅。一個衝突的解決和一個敵人的消失造成了帶來新衝突的和新敵人的個人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力量。冷戰的結束並未結束衝突，反而產生了基於文化的新認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團（在最廣層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間的衝突的新模式。與此同時，共同的文化也促進了共有那種文化的國家和集團的合作……”<sup>25</sup> 國際關係如此，國內關係也是如此。2004年，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中主要就國內的文化差異來說明國內衝突的可能：

承認差別，不一定就會引起競爭，更不一定會引起仇恨。然而，即使是心理上並不需要什麼仇恨心的人，也可能陷於最終與人為敵的過程。要區分，就必然要比較，看“我們”跟“他們”區別何在。要比較，則會作出評估：“我們”的做法比“他們”的做法是優還是劣。群體的自我中心主義會讓人有理由證明自己比別人強，需要證明自己群體的優越性。競爭導致對立，使本來較狹窄的區別感導致強烈和較根本性的同異感。這種認識模式固定下來，就會將對立面妖魔化，使對方變成敵人。<sup>26</sup>

這是一幅觸目驚心的文化景觀：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由全球移民分別構成的無數“我們”在與“他們”的對立中構建著自己的身份，這種文化分裂最終可能導致國將不國。

多元文化不但造成分裂，還會加劇以美國為核心國家的西方文化的衰落：“多（元）文化主義實質是反歐洲文明。……它基本上是一種反西方的意識形態。”“多（元）文化主義者直接向美國的‘盎格魯至上’形象提出挑戰。”<sup>27</sup>亨廷頓擔心，多元主義文化可能意味著美國和西方文明的終結。美國的文化根基在歐洲，非西方的美國不成其為美國，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不在於發展方式的不同，而在於它的價值觀和體制的獨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最為顯著的基督教、多元主義、個人主義和法制，它們使得西方能夠創造現代性，在全球範圍內擴張，並成為其他社會羨慕的目標。這些特性作為一個整體是西方所獨有的……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sup>28</sup>亨廷頓沒有解釋，他所拒絕的文化多元主義與被他包含在西方特性之中的“多元主義”有何不同。他也沒有解釋，如果全球文化的共存需要接受多樣性，何以美國文明的存在就不需要多元文化主義？

觀點上的矛盾源自現實的困境。對於非西方文化來說，尊重並維護文化多樣性，首先是一種文化倫理：不同的文化在共同創造著世界和生活的豐富性，沒有一種文化可以凌駕於另一種文化之上。其次也是一種政治論辯：多樣性蘊含著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差異性，承認不同文化就要連帶承認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對於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來說，尊重和維護文化多樣性可能導致美國身份的模糊和政治共識的喪失。布熱津斯基說得明白：“隨著美國日益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除非面臨真正大規模和被廣泛認為是直接的外來威脅，在美國國內就對外政策問題達成共識將更加困難。這樣的共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在冷戰期間是普遍存在的。然而，這種共識不僅植根於公眾普遍深信並認為正受到威脅的民主價值觀中，而且源於同作為敵對性極權主義受害者的絕大多數歐洲人在文化和種族上的親近感。”<sup>29</sup>從

而，要繼續保持美國文化軟權力，只能是對外強調美國文化的普世性，對內堅持美國文化的獨特性。這就是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給出的結論：在文明衝突的時代，美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不應當是世界主義的，這意味著世界給美國定形；也不應當是帝國主義的，這意味著美國改造世界，而只能是“民族性質方案”：保持並加強美國自立國以來所獨具的素質。這一結論的基礎依然是美國文化優越論。正如保羅·肯尼迪在談到“文明衝突論”時所說的：“人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憂慮，關鍵在於他們認為自身的種族和語言集團在歷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無與倫比的特點，對世界文明有貢獻，因而必須使自已的人口持續增長，進而來保持自己的種族集團。”<sup>⑩</sup>但亨廷頓比肯尼迪高明，他看到了界定美國身份的困難：

假如美國的特性就在於普世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則，那麼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大概就是把這些原則推廣到別的國家去。可是，假如美國是與眾不同的“例外”，那麼在別國促進人權和民主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假如美國主要是多種文化和民族實體的聯合體，那麼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促進這些實體的目標實現，我們就該奉行“多文化的對外政策”。假如美國首先是一個具有歐洲文化傳統的西方國家，那麼我們首先就要注意加強與西歐的聯繫。假如外來移民使美國成為比較具有拉美裔文化特性的國家，那麼我們的注意力首先就該放在拉丁美洲。假如美國的特性主要不在於歐洲文化，也不在拉美化，那麼美國對外政策就不要跟我們與別國的文化聯繫在一起。國民特性的其他定義還會衍生出另一些不同的國家利益和政策目標。對外政策上的爭論，其根源就在於我們在國內是什麼人這一方面的爭論。<sup>⑪</sup>

如何界定美國身份直接關係到美國的對外政策，關係到美國的軟實力和大國地位。所以，身份政治、認同政治也是國際“文化政治”的主題：“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這些社會日益伸張自己的文化，已經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認。”<sup>⑫</sup>

結合亨廷頓對美國特性的分析，“文明衝突論”的意義才真正顯示。作為一種解釋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衝突論”不是在提倡文明的衝突，而是對已經存在的國際、國內的文明衝突的誇張性說明。這種刻意強調甚至誇大確實存在的文明衝突，從政治上說，是在尋找敵人以確定自我。在《誰是美國人》中，亨廷頓說到敵人之於美國身份的重要性：

1987年，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高級顧問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告誡美國人：“我們正在做一件對你們來說真正可怕的事情——我們正在讓你們失去敵人。”……公元84年，羅馬打敗了它最後一個強有力的敵人米特拉達梯以後，蘇拉（羅馬統帥——引者按）問道：“如今世上再也沒有我們的敵人，共和國的命運會怎樣呢？”1997年，歷史學家戴維·肯尼迪問道：“當一國的敵人均最終消失，使它的存在再也不受威脅從而沒有外部力量再激發它的活力時，它的國家特性會怎樣呢？”蘇拉表示他的憂慮後不過幾十年，古羅馬共和國就垮了，出現了愷撒的專制獨裁。美國大概不會遭到類似的命運。然而，長達40年間，美國充當了“自由世界”反對“邪惡帝國”的領袖。“邪惡帝國”沒有了，美國該怎樣給自己下定義呢？<sup>⑬</sup>

在沒有敵人的世界擬想一個敵人以維護美國的國民特性和文化身份，這不是未雨綢繆，也是美國軟實力的一種表現：它能夠敏感地把文化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在批判自己的消費文化、流行文化中重建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以增強國家軟實力。

文明或文化之間並不必然地發生衝突，但確實存在衝突。一個理想的設想，是用文化的辦法

而不是用非文化的武力或暴力來解決“文化政治”問題。因此，無論是“軟實力”理論還是“文明衝突論”，都有過度政治化的傾向。文化當然是政治、有衝突，但文化還有共享性、人類性。一個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更應當在理論上重視文化的普遍內涵，在實踐上致力於文化交流和融合。文化政治從根本上講，應當是和諧政治、大同政治。這正是中國文化的優勢所在。

①馮友蘭：《新事論》，《三松堂全集》，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5～216頁。

②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2～372頁。

③④⑤⑦約瑟夫·S. 奈：《硬權力與軟權力》，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8、106～107、6～7、117頁。

⑥約瑟夫·S. 奈：《權力大未來》，王吉美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20頁。

⑧當然，以“軟實力”為美國的國際戰略是一回事，“軟權力”的客觀存在是另一回事。比如，中國政府歷來反對美國“和平演變”的戰略，對來自西方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也一直持批判性立場。但是，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硬實力明顯增強之後，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也成為國家議題之一。2006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使用了“提升國家軟實力”的說法，次年又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從此，“推進中國的軟實力建設”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

⑨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張世鵬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⑩⑪⑫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175、171頁。

⑬⑭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主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5年，第199～200、206～209頁。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88～89、60、67～68、97、134～135、26～27、45～46、135、360、356頁。

⑳格爾茨：《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㉑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1993），中譯《大失控與大混亂》，潘嘉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80頁。

㉒門洪華主編：《中國：軟實力方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頁。

㉓亨廷頓概括這一思潮的主要觀點是：美國是由許多的種族群體構成的；每一種族群體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在美國社會居主宰地位的白人盎格魯—新教傳統的精英文化；這一文化壓制、強迫或引誘其他種族的人接受盎格魯—新教文化；公正、平等及少數種族的權利要求將這些被壓制的文化解放出來，各級政府和私營機構應鼓勵和支持這些文化的振興。美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文化獨霸的社會，大熔爐或番茄湯的的譬喻說明不了真實的美國，相反，美國是馬賽克，是沙拉，是“涼拌沙拉”。（《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第125頁）

㉔㉕㉖㉗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2004），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20、125～126、8、189頁。

㉘保羅·肯尼迪：《未雨綢繆——為21世紀作準備》，何力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作者簡介：**單世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文化產業與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40

[責任編輯 陳志雄]